

贵州仡佬族学会 编 熊大宽 主编

仡佬族

文化百科



全书

贵州民族出版社



仡佬族文化百科全书



贵州仡佬族学会 编

贵州民族出版社

百科全书

责任编辑 陈光明
封面设计 吕凤梧
技术设计 姚南平
责任校对 曹永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仡佬族传统文化全书 / 熊大宽主编. — 贵阳: 贵州民族出版社, 2002.9

ISBN 7 - 5412 - 1033 - 1

I. 仡... II. 熊... III. 仡佬族 - 民族文化 - 简介
IV. K28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71539 号

仡佬族传统文化全书

贵州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贵州创兴彩印厂印刷

开本: 850 × 1168mm 1/32 印张: 7.125 字数: 190 千

2002 年 7 月第 1 版 200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2 000 册

ISBN 7 - 5412 - 1033 - 1/Z·87 定价: 15.80 元

序

仡佬族是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一个血肉相连的兄弟成员。很早以前，仡佬族的古代先民，分布在江汉流域以至今川滇黔交接一带。先秦时期，史书上将其称为“濮人”（或写作“卜人”）；魏晋南北朝时期，在许多汉文史籍上，又将其与分布于今两广一带的古越人一起，泛称为“僚人”；到唐、宋时期，仡佬族从僚人中分化出来，形成单一民族，史书上出现了“葛僚”、“僜僚”、“佶僚”等称谓，都是“仡佬”族称的同音异写。这些称谓在不少场合一直沿用到近代，解放后才正式统一使用“仡佬”作为本民族的族称。

仡佬族具有悠久的历史。早在商、周时期，居住在今江汉一带的濮人，就与中原有了较为密切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据《逸周书·王会》、《尚书·牧誓》等文献记载，商代时濮人就曾以丹砂向王朝进贡，武王伐纣濮人也参与了牧野之役。春秋时期，楚国强盛，与濮人多次发生征战，江汉地区的濮人除部分被融合于其他

民族之外，其余部分被迫逐步迁往今湘、鄂西以至川滇黔境内，与当地濮人汇合。

今川、滇、黔交接一带，早在先秦时期，即有不少濮人居住，只因当时与中原交往较少，史籍基本没有记述其活动。但从解放后大量考古资料证明，西周后期以来，由于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至迟到战国时期，已形成了夜郎、滇、邛都三大族群。在夜郎族群中就包括有夜郎、且兰、牂、句町、漏卧、同并等早期奴隶制方国，其中以夜郎势力最大，成为诸小国拥戴的中心。

秦统一六国前夕，夺取了楚国西部，将今湘、鄂西及黔东北一带濮人居住地区置为黔中郡。统一后，又派常頔（或作颇）开通了自今四川宜宾到云南曲靖的“五尺道”，并在沿道的夜郎、滇、邛都三大族群所属诸小邑境内“颇置吏”，将濮人分布的许多地区，纳入了统一的封建中央集权的郡县体制。

不久，秦亡汉兴。汉初，统治者忙于在内地恢复被秦末农民起义打乱的封建秩序，无力顾及西南边疆，乃“闭蜀故缴”，于是夜郎等小邦又恢复了各自发展的状态。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派唐蒙出使夜郎，与夜郎王多同达成协议，“约为置吏，使其子为令”，随之夜郎旁诸小邑亦纷纷内附，汉王朝乃将归附各小邑，连同从原巴、蜀二郡划出的部分县，合并成立了犍为郡进行治理。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且兰因抗命不出兵助汉征南越，“杀使者及犍为太守”被灭，次年（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汉乃将夜郎族群各小国从犍为郡划出与原为南越役属的西瓯骆部分属地一起，另设为牂牁郡进行治理。

当时，汉王朝虽在夜郎等地设置了郡县，但这些郡县仅只是些政治、军事的据点而已，其余广大地区仍由当地民族上层，“毋赋税，以故俗治”，实际上是一种“郡国并存”的局面。所以不但夜郎和滇王在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受王朝赐与王印，夜郎族群的句町首领亡波，也在昭帝时助汉击败叶榆、姑缯被封

为王。

及至成帝河平年间（公元前28至公元前25年），夜郎、句町、漏卧相攻击，夜郎王兴持强跋扈，不听汉使调解，并“刻木象汉吏，立道旁射之”，为牂牁太守陈立诛杀。兴岳父翁指又拥兴子邪务“挟旁二十二邑反”，不久也被镇压，夜郎遂亡，濮人在西南的势力遭到一次重大挫折。

且兰、夜郎被灭后，句町成为夜郎族群的代表。新莽时期，推行民族歧视，贬句町为侯，并诱杀句町王邯，引起以濮人为主的“三边蛮夷愁扰尽反”。王莽先后派数十万大兵前往征讨，战火绵延六七年，直到东汉王朝建立，统治者许以恢复句町王爵，斗争才告一段落。在反对新莽的长期争战中，濮人虽取得了胜利，但自身损失也很大，因而逐步失去了在西南地区的主导地位。西晋末，虽还有牂牁大姓谢恕“保郡为晋”，抵御成汉侵扰，但势力已日益衰落，逐步沦为益州（今云南东部）今彝族先民大姓爨氏的附属。特别是在成汉李寿统治时期（公元338至343年），“以郊甸未实，都邑空虚”，乃“从牂牁引僚入蜀境，……布在山谷，十余万家”。加上自东汉后期以来，濮人不断被自今滇东北迁入的彝族先民融合，如在彝文文献《西南彝志》中，就有不少“濮变夷”的记载。再加以后历代封建王朝的歧视驱迫，不少仡佬族群众被迫隐瞒自己的族属成分。以致到解放初期，自报仡佬族者仅三万余人。只是在“文革”以后，进一步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大批仡佬族才得以返本归源，恢复了自己的民族成分。目前，仡佬族人口已接近50万，分布在以贵州为主的川、鄂、湘、桂、滇几省（区）的广大地区。

在几千年的漫长历史进程中，仡佬族广大群众及其先民，在生产和阶级斗争的实践中，以自己的辛勤劳动和智慧，创造了丰富而灿烂的物质和精神文化，为伟大的中华文化增添了绚丽的光彩。

仡佬族在历史上是一个典型的农业民族，早在战国秦汉时期，仡佬族先民就以自己的辛勤劳动开发着祖国西南山区。他们在平原河谷地带，开田辟土，种植谷物，兴建城镇，对广大山区则“畲山为田”，使广大地区呈现出一派“耕田，有邑聚”的繁荣景况。到了唐、宋时期，在仡佬族分布较为集中的牂牁、东谢、西赵等地区，更是“土气郁热，多霖雨，稻粟再熟”，对祖国西南山区的开发，作出了应有的贡献。所以，民间长期流传着“仡佬、仡佬，开荒辟草”的谚语。至今许多地区，仡佬族出表，沿途不丢买路钱，就是表示这些地方是仡佬族先民最早开发的。另外，每逢“吃新节”，仡佬族可以任意到其他民族田地里采摘少量谷物、瓜果，祭祀祖先，不受阻拦，也表示了其他民族对仡佬族先民开荒辟草的公认。

仡佬族不但掌握农耕技术较早，矿冶也是他们很早就熟练掌握的传统工艺。如前所述，早在殷商时期，今江汉地区的濮人，就以丹砂作为向王朝的贡品，以后辰砂一直成为历代驰名的产品。到两汉时期，据《后汉书·郡国志》记载，谈指出丹，夜郎也以产与丹砂伴生的雄黄、雌黄而驰名。直到近代由丹砂提炼的汞（水银），仍是仡佬族地区的著名产品。

先秦两汉时期，仡佬族尚未掌握铁冶技术，当时使用的铁器主要依靠巴、蜀输入。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仡佬族先民在与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中，已学会了铁冶技术。如据《华阳国志》记载，与牂牁邻近的建宁郡已设有铁官。以后仡佬族工匠更能根据本地生产实践的需要，不断改进锻造技术，制作出适合当地使用的许多手工业、农业生产工具，他们将工艺世代相传，受到各族群众的欢迎。因此明、清以来，这部分仡佬族就被称为“打铁仡佬”。

如果说仡佬族掌握冶铁技术还较晚的话，那么他们掌握青铜冶铸技术，不但时间较早，而且从考古发掘资料看，工艺也很精

湛。如解放后在今毕节青场发掘的，相当于西周后期的瓦窑遗址中，就有铸造鱼镖和铜剑的石范6件；在赫章可乐柳家沟发掘的，相当于战国或稍早的遗址中，也发现残石范1件；特别是在普安青山铜鼓山，相当于战国到西汉的遗址中，发现铸造各种器物的范、模达46件之多。尤以其中一件铸钺石范上，有一“卐”形符号，与兴义地区地下出土和民间收集的同类器物的纹饰吻合，证明这些器物即为普安生产。另在赫章可乐、辅处等处，发掘出土石寨山型铜鼓数石，型制厚重，花纹繁缛，工艺精湛。应证《魏书·僚传》记载，僚人善于“铸铜为器，大口宽腹，名曰铜囊，既薄且轻，易于熟食”。而铜鼓本由铜囊发展演变而来，最初既是炊具又是乐器，后来才专以之作为乐器。说明仡佬族先民很早就熟练掌握了铸造青铜工艺的技术。至今铜鼓仍为西南许多兄弟民族珍视的乐器。

仡佬族居住在西南山区，长期与石头打交道，石雕成为他们传统的工艺之一。现存于安顺市内原文庙中的透雕龙柱，气势雄伟，形象生动，刀法刚健，被列为国家级保护文物，就出自仡佬族匠人之手。

仡佬族居住的西南山区，崇山峻岭，古代时期森林茂密，毒蛇猛兽出没其间，且气候潮湿，常有瘴气为害。为避虫蛇野兽及瘴气之害，他们多“依树积木，以居其上，名曰干栏”。以后随着社会的发展，逐渐改进，将这种干栏式建筑改建在依山傍水的半坡地带。或将地势平整，将房屋建成二层，或依据地形将房屋修成半边吊脚楼，上面住人，下面堆放杂物或豢养牲口。既可起到避免虫蛇、地气之害的作用，又可有效利用土地，减少工时的效果。有的地区的仡佬族，则充分发挥就地取材的优势，整个房屋建筑完全用石料叠砌而成，除门、窗、檩条外，基本不用木料。这种房屋不但坚固耐用，而且冬暖夏凉，至今仍为许多兄弟民族喜爱。

以上所叙，仅是仡佬族传统文化中几项较为突出的表现，其他方面的内容，本书已有详尽介绍，不再赘述。

不过按现代文化人类学观点，一个民族的文化，可分为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几个层次。物质文化是基础，精神文化为上层，制度文化则是集中体现。本书因受原编制体例限制，未将仡佬族及其先民在制度文化方面的发展演变加以阐述。这虽不能不说是个遗憾，但我们相信，本书再版时将会得到补充，使本书更加臻于完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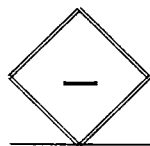
同时，我们坚信仡佬族广大群众，在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遵循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事业中，一定会更加奋发进取，继承和发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传统，吸取其他民族的先进文化成分，同全国所有兄弟民族成员一起，为中华民族的振兴，繁荣祖国文化，作出更加杰出的贡献。

侯绍庄

2001年8月15日

目 录

序	(1)
一、概 述	(1)
二、语言文字	(13)
三、信仰崇拜·巫术·占卜	(34)
四、伦理道德·哲学思想·行为规范	(49)
五、经济·科技	(71)
六、教 育	(87)
七、文 学	(95)
八、音乐·舞蹈·戏曲	(110)
九、军事·体育	(120)
十、天文历法	(131)
十一、医 药	(134)
十二、民间工艺·美术	(158)
十三、建 筑	(163)
十四、风俗习惯	(170)
十五、文物古迹	(210)



概 述

仡佬族是世居我国西南、中南地区的一个古老民族。据史书记载，早在殷商时期，其先民濮人就已活动在西南、中南广大地域。居住在今江汉一带的濮人，就与中原有较密切的联系。

濮人是我国古代人口众多、支系纷繁、分布辽阔的庞大族群，又称“卜”或“百濮”。商代时濮人就曾以丹砂向王朝献贡。周武王伐纣，濮人与庸、蜀、羌、髳等部族参加了牧野誓盟。

春秋时期，濮人在西南地区建立早期奴隶制国家。据《史记》载“濮在楚西南”。楚国强盛，与濮人多次发生争战。据《国语》载，周匡王二年（公元前611年），为对抗楚国，“麇人率百濮聚于选，将伐楚”。这说明濮人力量也不弱，才敢于与楚国抗衡。到战国时，濮人势力衰落，南部为南越国所占，濮人又相继在北部建立了夜郎、骠、僰、且兰、毋敛、句町以及滇、漏卧等地方邦国。据《左传》载，鲁昭公19年（公元前523年）濮人被楚国战败。迄后，濮人大部分与其他部族融合，一部分被迫西迁。战国时代，夜郎国势力扩展迅速，其所辖疆域约包括今贵州大部、云南东北部、广西西北部及四川南部等地。《史记·西南夷列传》：“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全国后，把上述濮人地区纳入了象郡、蜀郡、巴郡管辖。西汉时期，汉武帝大力经营西南地区，直到成帝和平二年（公元前27年），夜郎亡，才结束了邦国林立的割据局面。

东汉时期，濮人在史书上被称为濮、僚或濮僚并称。如晋常璩在《华阳国志·南中志》中记为“夷濮”；《后汉书·西南夷传》则记为“夷僚”。《水经·若水注》既有“夷濮”，又有“夷僚”的记载。在《华阳国志》中还有“谈稿县有濮僚”、“兴古郡……多鸠僚濮”的记载，魏晋以后，濮称消失，以僚专称。据《魏书》载，“僚者，盖南蛮别种，自汉中达于邛笮、川洞之间，所在皆有。”晋张华《博物志》载，“荆州极西南界至蜀诸民曰僚子。”晋郭又恭《广志》载，“僚在牂牁、兴古、郁林、交趾、苍梧”。由此可见，僚人是由濮人长期发展而成的。

东汉后，濮人的称谓由濮渐向僚称过渡，在南北朝时，越、濮统称为“僚”，之后，僚逐渐成为濮人的称谓。在晋代的《华阳国志·南中志》、《后汉书·西南夷传》、《水经·若水注》等汉文献中均出现“夷濮”、“夷僚”或“濮僚”的记载。

隋、唐时期，僚人经过长期的发展，逐渐形成“仡僚”，（最早见于隋黄闵《武陵记》）。在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中也有记载。据北宋陈彭年等修撰的《广韵》解：“僚”作为部落称谓当读作“佬”，说明仡佬即僚人。宋代，欧阳修、宋祁在《新唐书》中称之为“葛僚”，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称之为“仡僚”，黄庭坚在《山谷全集》中称之为“僛僚”，朱辅在《溪蛮丛笑》中称之为仡佬。元代，脱脱在《宋史》中称为“佶僚”。这些称谓虽然繁多，但都是“仡佬”的同音异写或谐音。到明代的有关著作中，更明确地记载了仡佬和僚人之间的承袭关系。田汝成在《炎徼纪闻》中说：“仡佬，一曰僚”；在《行边纪闻》中又说：“仡佬，一曰仡僚”；《嘉靖图经》中也说“仡佬，古称‘僚’”。清代，有关仡佬族的记载，在《贵州通志》、《黔南识略》、《黔南职方纪略》等书和贵州各地方志中更是“无处无之”。

三国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分裂割据时期，各地诸侯烽烟四起，互相攻杀，使生活在南中地区的仡佬族先民僚人蒙受了巨大的灾

难。据《三国志·霍峻五连向朗张裔·杨洪、费诗传》载，“霍峻字仲邈……时永昌郡夷僚恃险不宾，数为寇客，乃以弋（霍峻之孙）领永昌太守，率偏军讨之，遂斩其豪帅，破坏邑落……。”

建兴三年（公元 225 年），诸葛亮又兵分三路平定南中，战争中的屠杀和战后的军事统治，引起了牂牁郡、兴古郡仡佬族先民的武装反抗，郡守马忠命令张嶷“领诸营征讨”。最后将俘虏的二千僚人全部押往汉中。长期的战乱和封建割据的纷争，使仡佬族地区烽火不断，战事频繁，大批仡佬人成为战争的牺牲品，有的被掠卖为奴，“公卿达于人遮之家，人僚口者多矣”；“每岁命隋近的镇，出兵讨之，获其生口，以充贱隶，谓之压僚焉”。有的被迫逃离乡土，强制移徙蜀地。《水经注·漾水》载：“李寿之时，僚自牂牁北入，所在诸郡，布满山谷。”《蜀鑑》卷四载“(李)寿既篡位，以郊甸未实，都邑空虚，乃徙旁郡户三千（应为丁）以上以实成都。又从牂牁引僚入蜀境……布在山谷十余万家”。至于被抛尸疆场，为战争所害人家则难以数计。总之，长达三百余年的割据混战，使仡佬族先民在分布地域、人口数量和民族经济等诸多方面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唐宋以后，封建王朝对西南各地内附或已被其征服的少数民族，分别设置了经制州与羁縻州县等机构进行统治。由于魏晋南北朝时的战乱，使仡佬族分布地域发生巨大变化，社会生产力水平遭到极大破坏，除掳杀、掠卖和迁徙的以外，大多移居僻远山地，或改名换姓，或隐瞒族别，杂居溪洞，其后，一直受封建王朝的统辖，社会经济发展十分缓慢。

明清以来，由于统治者施行民族歧视和阶级压迫，各地土司又凭借中央王朝的支持，使仡佬族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稍不遂意，则吊拷其家，行刑毙命”，或“披草为衣，专与保傭雇工。”残酷的统治和压榨，必然要激起仡佬族人民的奋起反抗。从明清至现代时期，英勇的仡佬族人民举行了一次又一次的反抗

斗争。但是，由于居住分散和历史的局限，每次反抗均以失败告终，每次失败又使大批的仡佬族人民惨遭屠杀，幸存者流徙他乡，家园被毁，财产被掠，真是“一自播兵蹂躏后，几家茅屋亦萧条”（《贵阳府志·余篇》），严重地影响了仡佬族经济的正常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随着党的民族政策的落实，大批仡佬族得以正本清源，恢复了自己的民族成分，经贵州各地仡佬族代表协商，报经国务院同意，统一称为仡佬族。

仡佬族大部分散居在贵州省的西北、西南和北部，人口49.3万（不含越南1000人）主要分布在贵州的务川、道真、石阡、思南、正安、凤冈、遵义、六枝、金沙、织金、仁怀、江口、松桃、瓮安、贞丰、晴隆、关岭、镇宁、安顺、紫云、平坝、清镇、普定、水城、纳雍、大方、黔西、岑巩；云南省麻栗坡、砚山、广南、富宁、马关；广西自治区的隆林、西林和四川省的古蔺、叙永等县（市）内；以及越南境内的同文、黄树腓等县。其分布区域大致在东经130°~109°、北纬23°~28°之间，以贵州为中心，呈东北向西南倾斜的狭长地带。除黔北、黔东北外，其余各县（市）境内的仡佬族村寨多者五六个，少者二三个。村寨相距达数十里至百余里不等。散居在汉、苗、布依、彝、土家等民族之间，呈点状分布。

1950年以来，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适合我国国情的民族政策，在民族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使广大仡佬族人民在政治上真正当家作主。1986年经国务院批准，相继在仡佬族聚居的黔北地区建立了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道真仡佬族苗族自治县。在六枝特区、遵义县、正安县、平坝县、普定县、大方县、黔西等县境内建立了仡佬族或与其他民族共署名的12个民族乡。使仡佬族地区经济、社会、文化都得到很大发展。

仡佬语属汉藏语系。由于仡佬族居住分散，彼此联系较少，

方言差别较大。大体说，仡佬族语可分为稿、阿欧、哈给、多罗四个方言。贵州平坝县大狗场、普定县新寨、关岭县麻凹、云南省麻栗坡月亮湾和广西壮族自治区隆林各族自治县三冲的仡佬语言较完整，男女老幼都会说。目前，仍然会说仡佬语言的，大约占全族人口的四分之一。其余地区，因长期与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杂居相处，关系密切，除少数老人尚保持一些语言外，普遍都与其他民族语言相融合，大多会讲汉语，有的还会讲苗语、布依语、彝语。在这种情况下，仡佬语的使用范围日益缩减，以致会说本民族语言的人日渐减少。仡佬族没有文字，很早就使用汉文。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仡佬族及其先民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创造了丰富的物质财富和灿烂的文化艺术。早在唐、宋时期，仡佬族人民已使用竹簧乐器，并有“踏歌”等。在历代统治阶级的压迫下，仡佬族文化艺术虽然遭到严重的压抑和摧残，但优秀的传统文化仍被保存下来，并不断有所创新和发展。

仡佬族没有文字，但用口头文学形式，将许多优秀的民间创作世代相传下来。现在流传在各地仡佬族民间的口头文学，有诗歌、故事传说、寓言和谚语等。其内容大多是反映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民族历史。

仡佬族的口头文学有苦歌、劳动歌、情歌、礼仪歌、新民歌等几大类，流行面广，内容比较丰富。其中，比较古老的由三四言以至十余言不等的长短句构成，韵律不规则，但构思比较完整。近二三百年来，受汉族文化的影响，歌谣在形式上逐渐采用了汉族民间歌谣的七言格调，由长短句结构、不限句数变为七言四句。由不规则押韵变为有规则押韵。

仡佬族歌舞淳朴而优美，且有自己的特点。音乐以歌唱为主，有山歌、儿歌、酒歌、孝歌、哭嫁歌、打闹歌、古歌等。山歌用于生产劳动、走亲访友、谈情说爱；儿歌主要是向儿童讲述

故事、传授知识；酒歌多用在喜庆宴会、迎亲送友；古歌主要是用于节日、祭祖拜神。这些歌的曲调不同，形式多样，各有特色，适用于不同的场合。

仡佬族常用的乐器有箫、笛、二胡、月琴、鼓、唢呐、芦笙（五管笙）和泡木筒等。仡佬族还喜欢吹木叶。这些乐器可独奏，也可以合奏。

舞蹈有芦笙舞和踩堂舞等。节日跳芦笙舞，踩堂舞则是仡佬族的一种丧葬仪式。地戏、傩戏和木偶戏等民间戏曲，一般是在春节、“吃新节”或重大喜庆时进行。此外，在遵义、石阡一带的仡佬族中，还流行花灯剧等。

仡佬族体育娱乐活动丰富多彩，最为群众喜爱的有打“篾鸡蛋”（也称“竹球”）、打“花龙”、打秋千等。黔北道真一带的仡佬族，每逢年节喜庆，均要表演高台狮舞，以志吉庆。高台狮舞在1995年昆明第五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上曾获银奖。

仡佬族的手工艺艺术，工艺精湛，有自己独特之处。如刺绣、染布、银饰、剪纸、编制、绘画、书法、雕塑等，工艺讲究，构思巧妙，风格独特，乡土气息浓厚。安顺市文庙的空心龙柱就是仡佬族石匠雕刻的，刻艺细腻精细，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和观赏价值。

仡佬族先民的房屋建筑形式，很早就见诸史籍。据北齐魏收《魏书》记载，僚人“依树积木，以居其上，名曰‘干栏’，干栏大小，随其家口之数”。唐杜佑《通典》记载：“南平僚，北与涪州接，部落四千余户，山有毒草及沙虱、蝮蛇，人并楼居，登梯而上，号为‘干栏’。”可见，唐朝时，仡佬族的住房，已由依树积木的形式发展成为能够防潮湿、防蛇虫的楼居。南宋时，据《溪蛮丛笑》记载：“仡佬以鬼禁，所居不着地，虽酋长之富，屋宇之多，亦皆去地数尺，以巨木排比，如省民羊棚，杉叶覆屋，名‘羊楼’。”这多在盛产木材的地区，房屋全由木质构成。

明清以来，仡佬族居住的房屋，有了很大变化。贫困之家“掘地为炉，厝火环卧”，富厚之家“用瓦砖封砌”。新中国建立后，随着经济的发展，仡佬族人民生活不断提高，住房条件已有了较大的改善，房屋建筑形式多样，房屋结构已不限于木质了，有砖木结构，也有筑土墙、木楼。

仡佬族住房一般都选择在依山傍水，或半山腰向阳处建筑。房屋多为三间，中间为堂屋，设有神龛，不住人。左右两间为卧室，并分别隔出半间设灶房、火塘，稍高的房屋，楼上堆放杂物，楼下住人。黔北务川、道真、凤冈、正安一带仡佬族的住房，中间堂屋比左右两间要凹进一些，形成一个厅口，中开大门，大门外往往装有高及胸脯的两扇腰门，便于在屋内观望外面的情况。这种结构设计合理，居住舒适。

仡佬族服饰，妇女穿“桶裙”（通裙）是其突出特点。据《旧唐书·南平僚》记载：“妇人横布两幅，穿中而贯其首，名曰‘通裙’。”宋代，《溪蛮丛笑》记载，仡佬“裙幅两头缝断，自足而入，阑斑厚重，下一段纯以红”。这种女裙自下而上穿着，颜色极为鲜艳。

明代，据《炎徼纪闻》中说：仡佬族裙式“以布一幅横围腰间，旁无襞积，谓之‘桶裙’。”而且极为盛行，“男女同制”，说明当时男子也着“桶裙”。据嘉靖《贵州通志》记载：平伐司（今贵定县境）仡佬族“男子穿短裙，妇人穿花桶裙”；苗民司（今石阡县龙洞乡）仡佬族“男子绾髻于顶，辫发短裙，妇人袭青珠二三串悬于颈以为饰”；西堡司（今普定县境）仡佬族“男女科头跣足，短衣摘须，妇人耳穿大孔，裳用花布横围之，曰‘桶裙’”；青山司（今息烽县青山乡）仡佬族“妇人以布染红作裙，无襞积，谓之‘桶裙’”；八舟司（今黎平县高屯乡）仡佬族“服不一，男子衣短衫，妇人穿花桶裙”。从这些记载中可看出，男子穿的“桶裙”较短，妇女穿的“桶裙”较长，且花色繁多。